(18)

目　　录

简忆我的艺术生涯……赵丽蓉(1)
忆先师张鹤桥……郑素秋(13)
浅忆父亲生前……张友德(19)
刘树桐其人其诗（附诗词十首）……纪长安(22)

热心水利事业的人——李棻……吴丙中(36)
三十年代宝坻城商号情况……丁鹏龄(43)
回忆老店华春号……郭仲九(55)

攻克宝坻城……武　宏(58)
七、九路军抗日始末……许有君　阎崇来(62)
抗联十总队……魏春起　朱兆平(69)
——1938年冀东农民抗日大暴动中
成立并活动于宝坻县的一些情况
义和团大薄甸反帝斗争……恒　庐(72)
中登惨案纪实……曹伯英(75)
参加傅作义部的前前后后……李泰祺(77)

畿东"李半朝"……闻始伟(94)
李菡经历小考……骆志安(133)

银鱼进京……珍　玉(137)
宝坻大蒜……吴　影(140)
龙虎庄的古柏……王　信(143)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简忆我的艺术生涯

赵 丽 蓉

宝坻县政协领导约我写点东西，让我跟家乡的亲人们谈几句话，我很高兴。我这辈子就一个大缺点——不识字，写不好。咋办呢？克服缺点呗，我哪，就把这大半辈子从事艺术活动的情况，简要地向父老兄弟们汇报汇报。

我今年61岁，属大龙的（1928年）出生在沈阳。我爸爸、妈妈都是宝坻县人，爸爸叫赵秉中，老家是宝坻县西庄村（现属黑狼口乡）。爸爸出身很苦，给人家当雇工。我爷爷饿死在荒土岗上。后来，我爸爸下了关东，到东北沈阳耍手艺，给人家剃头。混得不错，就把我妈接出去了。我们姐弟八个都是在东北生的，哥俩、姐六个。我是最小一个，大排老八，小排老六。过去最末一个都喜欢生个小子，结果又是一个丫头，我爸有些反俗，他说生个老丫头更好，你们不喜爱我喜爱，给我起了个乳名叫老爱。

我家里人口多，买卖也不好，净指剃头很难维持生活了。因我爸爸手艺好，被一个叫芙蓉花的评剧演员请了去，专门给他梳头。

芙蓉花是东北有名的演员，她演的《小老妈进京》在东北红得不得了。戏里的小老妈需要梳两个头。前边一个小老妈，后边进京时还得改装，再梳一个。要请名师梳这个头。请到了我爸爸给她容装。

我爸常给芙蓉花容装，慢慢地熟了。她就喜欢上我爸，我爸也挺喜欢芙蓉花的。芙蓉花就兄妹俩，她的哥哥叫王顺堂。我爸一看，这小伙子不错，就把我的大姐给了他。这么着，芙蓉花就

是我的戚家姐姐，从此我们全家经常接触艺人亲戚，一家人都走上了文艺的道路。

从我的大姐嫁给芙蓉花的哥哥以后，我的二姐、三姐、四姐和我的二哥都学了戏。等我懂事的时候，哥哥、姐姐已经都唱红了。我的二哥叫赵连喜。后来在《杨三姐告状》里演高拐子，在《刘巧儿》里演巧儿的爸爸刘彦贵。他演的角色现在还留在人们的心目中。

我在很小的时候，就被人抱上台。老戏里不是有彩娃子吗，过去叫大师哥，后来叫彩娃子，凡有这类的戏，都把我抱出去。那时有的小孩一见观众都要哭，可我不知道害怕，上台见观众就乐，观众也乐，我也乐，从来没有哭过。我长大了点，大概四、五岁吧，叫我演了个角，《败子回头》里有许多妓女，里里外外的迎客。给我扮一个白毛老太太，是一个混了多年的老妓女。我当时不过四、五岁，才这么高，又扮一个白毛老太太出门接客，到场门那里还得出点戏，冲着客人"调棒"，一"调棒"就满堂喝采。这么一点的小孩，就能适应舞台这些事。从此，凡是有小孩的活，就是我的。原先的《杨三姐告状》里边有个讨帐婆，老高家开的"双胜合"原来是两家开的，后来变为高家一家了，原先的东家老婆领着两个孩子找高家讨帐。其中的一个孩子都是我演。

八岁那年，我妈想得周到，觉得当时的日子可以过了，闺女、儿子都学唱戏了，手里有点积蓄、想到要有个安定的地方，叫孩子们念书。我花姐（即芙蓉花）资助给我们一部分钱，在老家（宝坻县黑狼口西庄）置了一所大宅院。当时，在我们西庄也算轰动一时，都说要饭走的老赵家发财还家了。那年，我跟爸妈一起回来了。

那个时候（1936年左右），西庄小学是宝坻县农村少有的一所洋学堂。我的老师现在还活着，上次（1985年）我回西庄老家的时

候，还见到了他。

刚从东北回来，就把我和我哥按进学堂上学。回来的时候，我和我哥都在戏班练着功，心里浮着，把我们圈在屋里，往那一坐，哪行啊，学不进去。老师让我们念书，写大字。我哥说：不行，还是让我给你们翻几个“小翻”吧。他一给大家翻，大家不住地喝采：“太棒了”。我哪，念书写字也不行。我说我会唱，给你们唱吧！我在东北时，那里有个唱得挺红的叫高百岁，是麒麟童（京剧名演员周信芳）的大弟子。我看过他的戏，能把他的《跑城》连词带动作都记下来，我就给他们唱。就是上学不入门，认字认不了。老先生找到我妈说，你的闺女和小子上不了学，他们不务这个，他俩课堂上坐不住，一个跳，一个唱，别的学生也学不好。西庄学堂是首办的，你的孩子上不好，别把我们学堂给搅了。

这个时候，我接交了一个好朋友，是李尔泽的闺女。李尔泽是“李半朝”的同族，家里阔极了。他有两个闺女，一个老八，一个老九。我跟老八拜了干姐妹。她们家待我很热情、招待很好。当时，我没觉到怎么样，把这事告诉我妈。我妈一听惊呆了，咳哎！咋跟她磕头呀？那是宝坻县的头等大户，跟人家攀亲、咱们怎么办呀！后来，我妈备了一份重礼，借了一辆小轿车子（没有小轿车子、进人家的门是不行的），弄得花枝招展的去拜亲家。人家一看赵奶奶来啦，迎接得挺红火。我妈进了人家的屋，他们让我妈抽大烟，我妈说不会。他们还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“李半朝”的传说，领着我妈看他们家的圣旨、皇上赐的黄马褂。从此，李、赵两家就算攀上亲了。我妈每次从外边回来就给他们送上厚礼。

我跟老八挺要好。我记得在家里过了一个大秋。秋后时我看她家有片枣林。这些枣树结了大大的铃枣，漂亮极了。我和老八俩人到这片枣林里吃过枣，特别甜，好吃。

我在老家呆一年多，接到上海我大姐的信。说我大姐要生孩子。上海没有小米和红糖，让我妈去上海多带小米和红糖。我妈带着我和我哥到了上海。刚到上海，正赶上闹事变，那时我九岁。

到上海，就更开眼界了。哎呀，这么大的上海，花花世界呀！啥都是洋的，记得那阵做饭用的锅是铝的就是日本货。市面上乱得很。天天有"号外"都是说日本要侵占中国之类的事。

这时，我花姐在上海文艺界唱得很红，我们到上海后，就转游起来。在上海、汉口、南京几个城市转。在这呆一、两个月，又到那个码头唱一个时期。

在上海时，芙蓉花带的班叫"复盛剧社"原先评戏组班时就有两班：一叫头班，一叫二班。成兆才那个叫头班、原先花姐也在头班，后来就分出来，又成立一个班叫二班，二班有许多原来头班的名人，如王万良、花小鲜、李小霞、李忆芬等。

当时老白玉霜也在上海，与我们打对台。他属新鑫公司。我们是永安公司。

那阵的公司很大。一个公司包括许多演出剧场，那阵叫"园子"，有京剧、评剧、越剧、昆曲、电影什么的。买票进公司，想看什么再买票进"园子"。我在那些公司里，随便逛。因为是小孩，没人注意。那时候，我看了好多东西，那电影，有无声的，有声的。记得那阵蝴蝶、阮文玉正红。我虽小、但已经知道了文艺界许多事情。

这时候，我也看到了许多文明戏，上海的文明戏最讲究，唱的是京剧，大都是清朝事，故事引人，演技也好。

在上海的时候，不但看了好多东西，我还跟着花姐演戏。记得每年七月七，团里都演《牛郎织女》，过天桥，一边一个小孩，我去这个男孩，那边小女孩是我的外甥女。

我花姐演了一个《大刺山》，说的是姐妹几个去逛大刺山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烧香还愿。戏没有什么内容，但里边有个“闪象”，很精彩。只有复盛剧社有这个活儿。当中一个大金佛，旁边小神、小佛，幕一拉，跟真的一样，观众一见，都惊呆了，大佛小佛身披亮片的服装，闪金闪银的。每到年关，都演这个戏。烧香拜佛吗，大吉大利。我就在里边演那个最小的小神童，化上装，站在那儿手捧莲花，好神气哩，戏演得好，还得二毛钱的彩钱。

上海要打仗，我们就往北转。先到了张家口。这时，复盛剧社在上海走了许多人，有留在上海做买卖的，有怕日本人到云南的。在张家口演戏，第一炮就打响了。演了些日子，又听说北京要不通车了，我们又回到北京。

到北京之后了，就赶上芦沟桥事变。我们家租赁了一所房子，院里有棵“爬山虎”，那上边都是红头大绿豆蝇。当时是怎么个情景，我不太懂，就知道不让出门，一会儿戒严，一会儿这个、一会儿那个，听大人们说，这儿打起来了，那儿打起来了，死了多少多少人，你看哪红头大苍蝇，爬满院里的花。天又热，北京脏得很。什么菜都没卖的，只有臭豆腐、酱豆腐，天天是臭豆腐、酱豆腐，家家都备粮，把粮食都屯齐了。没等几天，日本进来了。芦沟桥失了。

我们住在大栅栏煤市街云积寺胡同、干节胡同、大马神胡同几处。这时又开始演戏。“三庆”、“广德楼”、“庆乐”都走遍了，还有个“吉祥”。在北京演出，也得找个“戳儿”（靠山），花姐找到了金少山，当了他的干闺女。金少山没事就来看花姐的戏，看花姐艺术上有造诣，很喜欢。过去在文艺界都要有个“戳儿”或叫名师，或叫靠山。喜彩莲就拜了马连良嘛。

从这时起，我们在北京安下根，算是有了基地了。不论到哪，北京就算是个家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开始学戏。拜了个老师叫马金贵，是打鼓的。当时也说得出，很有名气。我们拜师，一般不拜名演员，要拜场面上的，就是文场或武场的。他们每天看

戏，看得是全貌，一个戏里，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，打鼓的都懂，知道各行当的艺术。

提起学戏，那是很苦的。早晨起来练功、喊嗓子。哪儿冷，哪儿有冰窟窿就去哪。比如北京窑台，城墙很高，早起就到那儿，对着城墙喊，最好找个有水坑的地方，说是嗓子可以练出水音儿，喊完了，一大堆小姐妹坐在一起，旁边有琴师、鼓师给拍着板，拍板教唱。最初不上弦，前边大师姐上弦调唱，我们小姐妹在旁边听着。给他们说戏，我们互相看着。那个时候学唱，一般都是老调。调儿好学，那韵味不好找，咱家乡宝坻县有个好处，就是评戏韵味足，不管大段小段，把小唱本拿起来就会唱，唱起来还有味。家乡的人民都会唱，连那算命的先生都会唱。我在家的时候，常有敲小糖锣的算命先生，我妈就把他请进来，给我们算命卜卦。属什么、多大岁数、把你一生的情况都唱着说。自己用弦子弹着唱。哎呀，那味真叫浓，好听极了。我学的时候，也不费劲，就能掌握那种韵味。我的嗓音并不好，但适应性强，多高的弦也能上去、多矮的弦也能下得来。小时候、师傅就说我是块"料"，我也不懂，听口气是在夸我。同样一段唱、腔调一个样，我一唱，味道就不同。一直到现在，我也老了，上下够不着，可人们说我唱出了自己的风格、自己的特点。我就觉得应该感谢家乡宝坻县。

我开始学的戏叫《十三姐进城》，后接演《回杯记》。我的开门炮就是《十三姐进城》，这个戏有唱功、还有身段。王春秀要私访二妹，扮个叫化子进不了城，十三姐将他带进城这么一段戏。后来就一出出的学了，什么《二美夺夫》、《美丰楼》，再有就是大戏《打狗劝夫》等。

以后，评戏的剧目少起来，业务也有点衰了。让京剧顶了。复盛剧社不排新戏不成。当时在长安剧院演出的是毛世来，演的戏是《武松与潘金莲》。那时不叫这个名字，反正就是这个戏。

被我们移植过来。复盛剧社又移植了文明戏《锯碗钉》、小翠花的《马思远》，又排了一些新戏，象《海棠红》等。移植各姊妹剧种，丰富了复盛剧社，演员们受到锻炼。我哪，广泛接触不同剧种，受到锻炼。这样，我又跟着花姐走南闯北。去西北包头、绥远、大同，到东北哈尔滨、沈阳、安东。当时是兵荒马乱的年月，走到哪都担心害怕。东北已经是日本占领区了。老百姓苦得不得了。我们住的楼房隔墙是木板的，这屋说话那屋都听得见。吃大米得偷着吃。中国人不准吃大米，因为是亡国奴。街面上卖的都是高粱米。路边道旁那叫脏啊，人们不知咋活过来的。那阵日本人给你打针，走着走着就碰上日本兵，把那十字袖章一戴，你跑也不行，绕道也不行，就得给你打针。那阵子东北缺白布，关里运不过去，都卡在车站上。那车站上堆的布像小山似的。有一次我们到了山海关，车停了，叫我们下车。虽说是夏天，在关外，又是夜里三点多钟，把我们冻得直哆嗦。日本兵搜查的时候，连踢带打，排队一个个搜。当亡国奴真不是滋味呀！

日本投降的时候，我们正在张家口，我已经十七、八岁了。花姐有病（她抽大烟）身体不行了，她就培养我唱她的戏，让我当主角。在张家口，前前后后我们一共呆了八年。

我们在张家口时，是剧院的“坐底包”。是三大块的剧班，京、评、梆三大块，来了京剧名角，就唱京剧，来了评戏的名角就唱评戏，来了梆子的名角就唱梆子。别人不唱 你得顶上去唱，很锻炼人的。

当时我们自己演的戏有原本《花为媒》、《可怜银娘》、《杜十娘》、《打劝狗夫》等。过去一个班子都有几个基础戏，到哪去有个“折子”，一拉多长，上边写着本班能演的戏，先给老板看折子，叫老板叫戏。

我们在张家口，正赶上张家口大哄抢，日本人退了，国民党

接收不过来，张家口空了，没人管，到处哄抢，把日本仓库打开了，什么东西都没人管。这时八路军进去了。八路军是1946年底进张家口的。

解放了，我就接触了新的文艺工作者，跟联大文工团和抗敌剧社的王昆、陈强、孟雨、郭兰英等人认识了。我还学排了解放戏《血泪仇》、《白毛女》、《兄妹开荒》和《夫妻识字》等。

解放军接收了我们旧艺人，斗争了赵光斗？领导我们的有贾克、王久臣，还有天津的何迟。那时，我们自由了，没有老板剥削了。挣的钱大伙分，几天一开份，拿包银，大家伙买金子，戴戒指呀，真解放了。当时花淑兰跟我在一起。我们美不到两年，跟国民党没谈好（指1946年国共谈判）国民党又来了。又打仗了，飞机轰炸，我们到山洞里边躲着去。这时，王久臣、何迟他们拿着手枪到处找我，想把我带走。让我爸给拦住了。我爸说："别跟他们搀合这个，什么派都得有皇上，没皇上就没根。"把我藏在大方桌底下，结果我就没走了。郭兰英就是这会儿走的。

国民党一进城，我们又吃苦了。老板赵光斗又起来了。当时八路军派去的那个人叫崔万喜，呆不了啦，到处抓他，他跑了。国民党里有个当官的，成天到剧团里来找茬儿，总叫我唱白毛女的歌，意思要抓我。我们一看张家口不好呆了，就回到北京。

回到北京后，就失业了。哪也不敢唱去了。生意都不好，也没处唱。过去艺人都不愿到天桥去唱，"街北"的不能上天桥，一去就"掉价"了。认可往外走，也不能去天桥。可是，人得活着，我哥哥就不怕，他去了天桥。我哪，就在家里打"蒜盘疙瘩"（布纽扣），那阵子不是有妓女吗，她们穿大褂，上边有好多"疙瘩"。我就给加工那个，干得时间不短，竟赚了一大团线。后来我哥去门头沟，我花姐又出马了，把我拉到门头沟，在门头沟唱着唱着，又打仗了。跟在张家口一样，挖煤的不挖煤，唱戏没人看，一片瘫痪。这时，我们自己排戏，排白毛女，没有剧本，跟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我哥俩人排，在张家口不是演过解放戏吗。不久，北京和平解放，我们占了华北剧院，演解放戏。小白玉霜唱晚上，我们唱白天。

解放不久，保定有个主演叫新艳琴，派人到北京来接我去做二路主演。演老戏，她是主演，我是二路；排新戏，我就是主演，因为我接受新的东西比较快，又有张家口那么一段的基础，演解放戏我不外行，演出后上座率很高。在保定呆了一年多，又到石家庄、邢台等地，后来，我哥把我叫到北京，跟新凤霞搭上帮，新凤霞这时候入军委剧团了，这是1952年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没离开。

到军委后，地方上要调，因为军委剧团很多，有王文娟的越剧团，有京剧团、杂技团、歌剧团、舞剧团，还有曲艺团。越剧团回上海，我们就落在北京。属中央文化部，初成立时叫评剧团，下边分队，我和新凤霞在一队；小白玉霜在二队。后来建评剧院，队改为团，一直到现在。

在团里，我和新凤霞一起，一直演闺门旦，排《刘巧儿》的时候，把团队界线打破了。新凤霞为A角，我为B角，新凤霞的妹妹为C角。天津也来了一帮，筱玉霞她们都来了。后来又排《小女婿》，新凤霞大肚子、卸车（指分娩），她卸车，我就演小女婿。有一次，排《小二黑结婚》，讨论角色时，大家都发愁，这个三仙姑谁演呢？咱队里没有这个行当。评戏演员反差大，比如老白玉霜和小白玉霜一起演《花为媒》，怎么演，老白玉霜演阮妈，小白玉霜演张五可。老白玉霜是主演、演阮妈，她闺女演张五可。喜彩莲、喜彩春一起演《花为媒》，喜彩莲是主演，演阮妈；喜彩春演张五可。看演员的技艺，装龙象龙，装虎象虎。三仙姑这个角，怎么挑也选不出人材来。大伙都说让我演，我不干，我不是这个行当的人啊！领导做工作：新凤霞坐月子，演不了，解放军又等着看咱们的戏。没办法，我就应下啦，排吧，演

吧！我掌握了这个人物，既放得开，又不过火，恰到好处，演的三仙姑比较真实、比较象，得到领导和观众的好评。从此，一个“三仙姑”就决定了我后边的命运。类似的角色都让我演，他们很赏识我的演出。以后跟新凤霞演对子戏，一碰上妈妈、闺女，这个妈妈自然就是我的活儿了。

后来，团里整理传统戏，排《花为媒》。这个阮妈谁来？左看右看只能给我。一下子，我就给他们演好了。因为那阮妈我看得太多了，从芙蓉花到老白玉霜，从老白玉霜到小白玉霜，所以这个活儿手到勤来。我一演，他们认为很好。后来边演出、边加工、改剧本，就上了银幕了。这个时候《杨三姐告状》也出来了。准备拍电影，都做了预算。这就到了“文革”前了，报纸上就有“把才子佳人赶下舞台”的标题了。一看这个，得，都打入冷宫，库存起来了。“文革”中当参考片，排样板戏时，把我们的片子拿出来当参考看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传统戏解放了。影片《花为媒》拿出来，又追拍《杨三姐告状》。新凤霞不行了，我跟古文月一起，拍了“杨三姐告状”。

我演的阮妈和杨母这两个人物，观众都很喜爱。常问我怎么演得那么好。我说，我自己并不怎么样，就是我看的名人多了。我看到的名人演出，现在的中青年人都没看到，演戏的根蔓很主要。《杨三姐告状》里的杨母，我看过高人演过，此人名叫张久凤，演得真好，绝了。他是最早演杨三姐的妈的。这个人是我三姐、四姐的师傅，我也管她叫师傅。这是一方面，再有就得感谢家乡啦。小时候我记得，在我们屋里的炕头上，坐着好多老婆、老奶的，他们烤着火盆、嗑着瓜子，有的叨着烟袋，有的乐得咪着眼。现在想起来真是一幅画，我一合眼，就有她们的形象。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眼前。另外，在艺术上我敢闯。如《杨三姐告状》这出戏，杨三姐一提出要告高占英，吓得杨三姐的妈由炕上一屁股掉到地下，当然，这要有一个好功夫、好根底。以前演

就没有这个动作，经我一闯，丰富了杨母的演技，突出了人物性格。

总之，要谈艺术成就，我就是敢想、敢闯，勤学多看，吸收他人之长，补自己之短。我在艺术上最大的特点，就是人和。人和是我艺术成就的关键。大家知道，我是演配角的，配角也有主角，也就是配角的主角，自我评价，我是配角中的主角。配角在一出戏中，也占有重要地位。如《花为媒》，没有一个好阮妈，张五可演得再好，这出戏也不能算好戏，拿不住观众。

我们在舞台上演惯戏的演员，拍电影实在不容易。在舞台上，演员随着锣鼓点动，拍电影就不行了，没有锣鼓点，还得有锣鼓点的表情。表情和舞台表情也不一样，一般的动作要小，一大，放出来就不好看了。戏曲演员，在舞台上指人，用两个手指头，拍电影就不能指，就得把这个动作取消，否则，银幕上就是两个大指头，拍《花为媒》时，王俊卿的爸爸有一段和阮妈对白："阮妈，……"这时用二指一指，导演讲停机，重来。第二次他还是指，又停机。他向大家（排戏的工作人员）作揖道歉，第三次开拍时，他忘了台词，大声地说："我不指了。"使人哭笑不得。

拍电影时，有一个前七秒、后七秒，就是开机后的前七秒白拍，一场戏拍完的后七秒也是白拍，便于剪接。有一次，一场戏拍完了，已过了七秒，导演仍不喊停机，一个动作作了一遍又一遍仍不停机，怎么办？机不停就得做，我一边做一边说："我的老天爷呀，可叫我咋办呀！"引的大家都笑了。

拍电影还有一个更大的难度，各场戏不是挨着拍，有时前后颠倒。演员演戏，是挨着演，情绪一浪高一浪。拍电影一颠倒，导演要的情绪我还没上来，有时我的情绪刚上来就停机，所以拍电影非常辛苦，一场戏一个镜头往往要拍多次。

最后，跟乡亲们拉拉家常，我是晚婚，到25岁才结婚（那是1952年），我爱人是老北大毕业生，原学法律和哲学，建国前在

China

北京搞法律工作，建国后搞过一段哲学，因他是老哲学（指建国前），与建国后的哲学正好相反，所以就改行了，到现在的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。1983年去世的。

我们夫妻共生三个儿子，没有女孩。大儿子在北京二商局一个公司当经理，专门批发烟酒的公司；二儿子是搞古建绘画的；三儿子在北京一个学院毕业，是搞金融工作的，现在法国留学深造。

我们家就是缺女孩，大儿媳、二儿媳给我生了两个小孙子。

我哪，1988年退休。退休也闲不住，现在，应河北省电视中心邀请，与梁音同志合作，（他是长影演员，就是电影《三进山城》演侦察排长的那位），在三河县拍电视，戏名叫《苍生》，剧本是浩然写的，写得好。大概春节可播出，请大家看看，多批评。我哪，有这么个打算：这次电视片成功，彻底退休，以享天年；不成功，则要重打鼓另开张，再接再厉，再作一次拼搏。但是《苍生》这出戏还没写完，如浩然再接着写下去，我还是要演的。

根据录音整理，未经本人审阅

整理者：闻始伟

作者简介：赵丽蓉，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，
原籍宝坻人，现住北京。

China

忆先师张鹤桥

郑　素　秋

先师张鹤桥老先生，已离开我们两年之久，他老人家的高尚医德医风，言行举止，精湛的医术，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正如我父赠诗所述：

刚正迎风立，医林不老松。
丹心怜患者，妙手救残生。
有术传帮带，无私见至诚。
良师争景仰，拙笔寄深情。

我的老师一九四六年毕业于华北国医学院，曾从师名老中医施金墨先生。并给先生主方（即先生念方学生写），当时施先生是华北国医学院院长，同时带徒很多人，能给先生主方，机会是难得的。听张老师讲，施先生对徒弟要求十分严格，处方只要写错一个字，就要重新开。而且字迹要工整。因而张老师练就一手好字，得到施先生的赏识和真传。继而经北京市政府统一考试合格后批准在北京挂牌行医多年。

解放初期，农村缺医少药。十几个村庄也没有一位先生。张老师原籍是宝坻县元罗庄乡南王庄。一九五六年正值农村的个体行医向联合诊所过渡。在回乡探家期间，张老师目睹农村有病无医的现状后，毅然决定抛弃了城市优越的生活与工作环境，回到家乡，参加联合诊所为家乡的人民医疗保健事业贡献力量，为大洼地区的贫苦农民患者排忧解难。

China

立志大洼，以院为家。

大钟庄洼是宝坻县有名的北大洼，地广人稀，村庄之间相隔较远，当时流传着一句顺口溜，“大钟洼有三件宝，苍蝇蚊子泥粘脚”。说的是苍蝇蚊子格外多，道路泥泞得很。生活条件很差。可是张老师竟选择了这最艰苦的地方，一直工作了三十多年，走遍了千家万户。大钟地区每个村有多少户人家、姓名、家庭人口，在那条街住都能熟记下来。那时以出诊为主，不管是刮风下雨，还是冰天雪地，有叫必应，每天都要骑自行车出诊多次。有一次在出诊的途中，突然自行车坏了，连人带车一起摔倒在冰雪地上，但是起来后想到病人，抛下车子，步行赶到病人家里。在回来的路上，找到自行车扛着回诊所。为病人解除了痛苦，尽到了一个医生的职责，自己再苦也无怨言。后来，逐步由诊所到卫生院、地段医院、至今发展为分院。这期间县卫生局曾几次调张老师到条件好的县医院中医科工作，但都被张老师婉言谢绝了：“大洼地区需要我，我也不愿离开这里的人们”。这是老师常说的一句话。的确也是这样，工作起来，很少休假回家，以院为家，不离开工作岗位。正如这里的人们所说“张先生把一腔血都洒在我们大洼了”。

高尚的医德　无私的品格

一九七五年，根据上级指示精神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，解决中医后继乏人的问题。要求名老中医都要培养徒弟，选择一名中医继承人。当时，我正毕业于天津市卫生学校医士班，被分配到大钟庄分院在内外科工作，不久根据老师提议，各级领导批准我被选为张老师的中医继承人，成为张老师的亲传弟子。从此每天上班我都在老师身边工作。老师教导指点，口传亲授，使我提高很快，不久就给张老师主方，一年后就独自门诊。老师严格的要

求，言传身教，学术上从不保守。使我不仅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宝贵的医学经验，也懂得了做一个医生的准则。老师要我永远记住毛主席“救死扶伤，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”的教导。而且要向孙思邈在《大医精成》中所言”凡大医治病，必当安神定志，无欲无求，先发大慈恻隔之心，誓愿普救含灵之苦。”从师学习八年当中，我时刻看到老师对病人不分高低贵贱总是那样平易近人，高尚的医德医风值得我们学医者永远学习。说很容易，做到是不容易的。张老师经常说：“我们是给人看病的大夫，不管病人高低贵贱，都要普同一等”。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张老师享有很高名望，慕名就医者，既有从天津北京唐山而来，也有从蓟县、玉田和宝坻城里而来，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来，是高级干部还是农民百姓，都能让他们抱希望而来，满意而走。治好很多疑难病症，但是从不吃请受礼，就连病人的一支烟也不吸。病人来了总是先让烟，这样可亲，首先使病人取消了紧张的心理状态，感到医生如同家里人一样亲切，似乎是来坐客一般。每治好一病，从不夸耀自己的成就，谈论别人的事非和短处。的确张老师具备了德艺兼优的好品质。不仅这样，张老师高尚的品格无私的精神还体现在孝敬老人，处理好工作与家庭关系等方面，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。张老师在家居长，解放战争时期牺牲一弟，尚有弟妹五人，父亲早年病逝，老母年高体弱在堂。当时因师母任教、定居在黑狼口乡，张老师在大钟庄工作，很少照顾自己的家庭，师母是知书达理的人，自己艰难的托儿带女、克服生活中一切困难，终因繁重的家庭负担而被迫退职，牺牲了个人的事业与前途，体谅和支持张老师的工作。不但平时老师很少回家，逢年过节必带上礼品到南王庄老母亲那里去过，直至老母病逝。张老师常说：“人什么都可以有，但生身父母只有一个，不可不孝”。在十年浩劫中，张老师无疑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，遭到了批判斗争甚至肉体上的折磨。但是以后这些斗争过甚至打过他的人来找他治病，

张老师从不借机刁难报复。他说："一个人不记乘人之危。一个大夫如乘人之病、报复与人，他[illegible]大夫，要宽容大度，不记前仇"。

德高望重　医术精湛

在医学界张老师可称宝坻名医，承师施金墨老先生属甘温派。注重扶助正气。擅长内科、妇科，尤其对妇科更有独到之处。在治疗内科病中注重调理胃气、调畅气血，承师擅用对药。如天麦门冬、五倍子、炙前胡白前……妇科以四物汤治血为主，因病而异，灵活化裁疗效显著。张老师能博采众长，不拘古泥古、并能注重现代医学参考辅助诊断，提倡中西医结合。

张老师在肝病辨治上有丰富经验。除利用清热利湿、清热解毒法外，还用芳香化湿解毒法，如藿香、佩兰。收到很好疗效、如孙家口村一女患者刘某，患黄疸型肝炎，全身黄染、症状较重、去宝坻住院未收，来找张老师治疗。经清热利湿芳香化湿法治疗痊愈。患者全家十分感激，送来感谢信。这样的病人是极平常的、举不盛举。再如唐山市机车车辆厂工人张庆尧、男、40岁，肝硬化脾机能亢进，血小板已降至4万，许多大医院都拒绝治疗，九死一生，慕名来求张老师治疗。经仔细辨证，以养血柔肝、健肝利湿化脾通络等法治疗。每月来诊一次，连续服药近一年恢复正常。以后每月来信一封介绍身体情况，辨证用药，通过邮局往唐山寄药，连服二年病愈上班，至今正常工作十余年。

又如，患者何仉庄乡小吴庄于某之母七十八岁高龄。患肝硬化腹水，腹大如鼓，形体羸瘦，经几个月的治疗，不但腹水消失，体质恢复，且又正常生活了五年之久，后因患它病而故。张老师在治疗肝硬化、腹水等方面有独特见解，不主张大攻大伐，亦不主张用三棱、莪术之类大破大消之品，经验证明用之反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